

人社部 2015 年社保报告：不到三个人“养”一个老人

人社部近日发布《中国社会保险发展年度报告 2015》，统计数据显示，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职工退休比下降至 2.84，为七年来最低水平。这也意味着，从全国来看，目前只有不足三个在职职工为一个退休人员医疗费用“埋单”。

报告披露，截至去年底，全国 28893 万职工参保基本医疗保险，比上年增 597 万，增长 2.1%，比 2010 年增加 5158 万，年平均增长 4%。其中，参加职工医保的在职人数 21362 万，占参保总人数的 73.9%，而退休人员总数为 7531 万，占比 26.1%。与 2014 年数据相比，在职职工人数占比下降了 0.5 个百分点，退休人员占比上升 0.5%。

值得注意的是，2015 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职工退休比(职工人数与退休人员人数之比)为 2.84，为连续第四年下降。2009 年至 2014 年，这一数值分别为 2.97、2.99、3.02、3.295 和 2.9。其中，24 个省份的职工退休比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根据职工医保政策，退休人员不缴费，



而退休人员均医疗消费大大高于职工，职工退休比下降预示医保基金收入减少，医保基金支出增加。

事实上，在医疗费用支出增加和老龄化

步伐加快的背景下，医保基金正面临越来越大的支付压力。《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报告 2014》曾预测，2017 年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将出现当期收不抵支的现象，到

2024 年就将出现基金严重赤字。

有观点认为，目前医疗卫生费用快速增长对医保基金结余形成压力，控制医药费用增长是解决医保基金可持续性问题的着力点。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表示，应把支付方式改革放在医改的突出位置，发挥支付方式在规范医疗服务行为、控制医疗费用不合理增长方面的积极作用。与公立医院改革、价格改革等各方联动，发挥医保支付对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的激励约束作用。

下一步将结合医保基金预算管理，全面推进付费总额控制，加快推进按病种、按人头等付费方式，探索总额控制与点数法的结合应用，建立复合式付费方式。同时医保要积极参与医药和医疗服务价格改革，制定与价格改革相适应的药品和医疗服务医保支付标准，探索建立引导药品价格合理形成的机制，促进医疗机构主动降低采购价格。

(李唐宁 李唯嘉)

过去一年超 20 万人获批新西兰工签 创下历史新高

8 月 15 日，据新西兰天维网报道，过去一年获批的新西兰工签数量高于此前任何时期。在截至今年 6 月底的过去一年间，有超过 20 万人获批了临时工作签证，比上一年增加近 3 万人。入境新西兰的新居民人数同比增长了 20%，达到 52000 人。

人口统计学家 Paul Spoonley 教授表示，这个数字是惊人的，目前还没有看到任何放缓的迹象，政府也没有要叫停的意思。

梅西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 Spoonley 教授表示，新西兰目前是所有经合组织成员中，流入新移民和工签人数最多的国家，一年又一年移民的数量不断增长，却一直看不到放缓的迹象，现在要么是申请人



自动开始减少，要么是政府出面表示移民已经够用了。

截至 3 月的今年前三个月，新西兰失业率为 5.2%。奥克兰商会称，雇主很难找到合适的技术工人。

Spoonley 教授认为，雇主们与其从海外雇佣人员，不如多培训新西兰本地人。

奥克兰商会首席执行官 Michael Barnett 则认为，城市的高移民率和雇主报告的技能短缺之间有脱节。

Michael Barnett 说：“尽管现在每周几乎有 800 名新移民定居新西兰，但许多人都没有建筑、健康和信息技术(CT)方面的资格，无法补足技能短缺的差距，政府的两大主要机构——移民局和商务、创新和就业局应该与奥克兰的商业组织联系起来。

Michael Barnett 表示，目前向海外招聘以满足本地需求的渠道并不通畅，许多移民也没有真正针对短缺职位，最明显的就是建

设部门，奥克兰需要修建更多的房子，但人手明显不足。

新西兰移民局总经理助理 Michael Carley 表示，新西兰公民和居民一直都是空缺职位的首选，海外雇员只有在本地居民无法满足职位需要时才会被允许进入新西兰工作，通常都是针对特定的技能短缺职位。

在过去两年，政府设定的移民接纳目标是 9-10 万人，现在，政府正在考虑未来两年，目标人数应设定为多少。

2015 年其他类别签证数量也有大幅上升，10 万人持学生签证入境新西兰，旅游签证的发放数量也几乎增加了四分之一，达到每年 60 万人次。

(佚名)

北上广深积分落户政策落定 居住证是硬性要求

8 月 11 日，北京市积分落户办法正式发布。至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等市区常住人口超千万的超大城市，均已提出或实施各自的积分落户指标体系。记者梳理四地积分落户政策发现，北京的制度设计上指标相对简明，除与上海一样采取了连续缴纳 7 年社保的国内最高门槛外，也设置了年龄、学历、创新能力、纳税投资等导向指标。其中，从城六区搬到郊区就业仅 3 年就可以积 12 分，不但速度和比重优于上海，其分数也相当于纳税投资积分的两倍。

上海 2010 年至 2015 年间积分落户共 2.6 万人，年均 5000 人；广州去年积分落户名额 4500 人。北京积分落户每年能解决多少人？学者经测算认为不会超过万人。

45 岁以下落户京沪可获加分

持有当地居住证是北上广深积分落户的硬性要求。目前各地居住证办理条件相对比较宽松，具有实质性影响的是社保缴费年限。北京要求的社保缴费年限与上海一致，均为 7 年。而广州要求 4 年，深圳仅为 6 个月。

在年龄限制方面，北京市去年 12 月发布的征求意见稿限定在 45 周岁以下，这与广州、深圳(分别为 45 周岁和 48 周岁)的规定相近，正式发布的政策则取消了这一限制，改为与上海相同的法定退休年龄以前均可。不过，北京、上海都对 45 岁以下者设了一定额度的加分，北京的加分权重更大。

强调吸纳年轻人，这与北京、上海的人口老龄化有关。截至 2015 年末，上海户籍人口中 60 岁以上者 30.2%，老龄化率领跑全国；截至 2015 年底，北京市 60 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 23.4%。

此外，广州、深圳均把无刑事犯罪记录、不违反计生政策规定作为申请积分落户的门槛，上海则将这两项列为“一票否决指标”。北京将无刑事犯罪记录作为积分落户条件，但对应是否违反计生政策未做硬性要求。

赋分力求公平

上海北京均设减分项

由于北上广深四个超大城市发展特点不一，积分落户指标体系也不尽相同。与广州、深圳、上海的单项分值最高动辄 60 分、100 分、140 分的不同，北京积分采取小分值设计，单项积分最高的博士(学历+学位)加分仅为 37 分。

北京市发改委负责人解释，北京的小分值设计注重把握不同指标间的分值匹配关系，另外积分指标体系设计简化，积分指标数量较少，便于操作。在分值赋予上，总体保持就学与就业、居住的起点公平。

跟广州、深圳相比，上海和北京都设置了减分项。如上海对申请人行政拘留一次减

50 分，提供虚假材料和有刑事犯罪记录则各减 150 分；北京规定一次行政拘留记录减 30 分。

记者发现，按北京的积分规则，一个申请者可能拿到的最高分数理论上约为 163 分，即：17 年(按 28 岁博士毕业计算)社保和自有住房 68 分，博士 37 分，创新奖 12 分，纳税奖励 6 分，年龄加分 20 分，国家级劳模 20 分。

而在上海，这样一个劳动者最高积分理论上可拿到 731 分，包括年龄加分 30 分，高级职称 140 分，社保也按缴纳 17 年计 51 分，创业人才 120 分，投资纳税 120 分，缴纳社保费高于社会平均基数 3 倍 120 分，省部级及以上表彰 110 分，配偶为本市户籍 40 分。

据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介绍，在上海，申请者只需达到 120 分，即申请者为全日制本科毕业生且缴纳社保满 7 年，便可享受比普通居住证更好的市民待遇(子女在上海可以报考高职等院校等)；而在居住证转户籍方面则不计算分数，居住证持有人只要无刑事犯罪、不违背计生政策规定、稳定就业和缴纳社保满 7 年，有中级职称即可，“落户预期相对明确”。

广州市的积分落户积分办法与上海类似。申请人只需在 5 个积分指标中(“文化程度”、“技术能力”、“职业资格或职业工种”、“社会服务”、“纳税”)累计总分达到 60 分即迈过“入户门槛”，之后只需比拼在本市缴纳社会医疗保险、失业保险的参保时间长短。

与上海、广州不同，北京的积分落户最终按照积分多少来排序。聂日明认为，这意味着北京的政策更有利于高学历、有房者等城市精英。

四地标准侧重创新人才 疏解人口加分北京超上海

项目赋分代表着人口导向。北上广深四个城市的积分办法都倾向于年轻人、高学历(技能)、创业能力强的人群。

北京市导向指标中，分数从高到低依次是：博士 37 分、硕士 26 分；省部级劳模、道德模范等荣誉 20 分；45 岁以下 20 分；职住由城六区迁往郊区 3 年积 12 分；创新创业奖励最高 12 分；纳税投资奖励 6 分。

与广州、深圳学历积分从技校、中专起步不同，北京学历积分从大专起步。在深圳，有大专以上学历并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资格或具有高级技师资格的申请人，可以获得和博士研究生一样的 100 分加分。上海、广州、深圳都将职称、职业技能作为加分指标，北京则没将职称纳入积分，仅仅将教育背景作为重要指标。对于设置教育背景指标，北京市发改委负责人的解释是：教育背景是体现



●北上广深积分落户政策加分项示意图(图/东方IC)

申请人知识结构和基本素质的重要方面。

北上广深四地均更青睐年轻人，并分别把 43-48 岁作为分界线。与广州、深圳直接将 45 岁和 48 岁作为申请积分入户门槛不同，上海 43 岁以下积 30 分，44 岁至 56 岁之间每增加一岁减 2 分；北京则是对 45 周岁以下者加 20 分。

在疏解人口方面，北京给予的最高分是 12 分，即办法明年实施后，申请人若就业和住房均从城六区迁往郊区，仅 3 年即可积 12 分。这一分数相当于最高分项博士 1/3。而在上海，在远郊重点区域工作和居住每年积 2 分，最多可积 10 年 20 分，仅为博士分值的不足 1/5。对比上海，北京在疏解人口的分数奖励更给力。

北上广深的积分政策都注重对创新创业人才的吸引，但项目和分值各不相同。对于创新创业人才，北京给予的最高积分是获国家级奖项加 12 分，约为教育背景最高分博士的 1/3；上海对创新人才最高奖励 120 分，与高级职称和博士相当。

在推动经济发展方面，北京纳税投资最高积 6 分，约为教育背景最高分的 1/6；上海纳税投资最高可积 120 分，与高级职称和博士相当；深圳最高可以获得 100 分，相当于博士研究生学历积分。北京市发改委负责人也表示，纳税指标的分值比重比较有限。

上海广州年均落户约 5000 人 北京每年落户规模不确定

落户难不难，取决于符合资格的积分者数量，城市每年安排的积分落户名额，以及积分落户方式。

目前，北上广深这 4 座人口超千万的城市都面临着控制人口的任务。

根据 2020 年的人口控制目标，北上广深的人口分别要控制在 2300 万人以内、

2500 万人以内、1550 万人以内和 1480 万人以内。未来五年，四个城市的常住人口增长空间分别为 129.5 万人、84.73 万人、199.89 万人、342.11 万人。

据了解，人口增长空间最小的上海，已经实现了人口由增转降：2015 年末的常住人口比 2014 年末减少了 10 多万人，其中外来人口减少了近 15 万。

与上海常住人口下降不同，北京 2015 年人口比 2014 年增长了 18.5 万人。根据北京市社科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今年 6 月发布《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5—2016)》，2015 年北京常住人口为 822 万余人，其中，近六成成为高中以上学历；近九成是“80 后”和“70 后”。

从积分落户实践看，深圳 2010 年至 2013 年 8 月 13 日共有 9.8 万名外来工积分落户，以大专以上学历为主、高级工技能人才为主、35 岁以下人员为主。上海从 2012 年起执行以积分制为主体的居住证制度，截至 2015 年年底，共 2.6 万人落户，年均约 5000 人。2015 年，广州积分落户的指标是 4500 名。

北京市 8 月 11 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市发改委相关负责人表示，北京市积分落户政策实行“总量控制+自愿申请”，每年根据实际申请人员规模，结合年度人口调控目标要求，通过综合测算统筹研究确定落户分值。每年的落户分值和规模均不确定。

北京每年能积分落户多少人？北京市社科院市情调查研究中心副研究员李晓壮告诉记者，严格控制特大型城市人口规模，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战略，不管积分落户上的术是松是紧，都要围绕这个战略来。根据相关指标测算，他认为，北京每年积分落户不会超过 1 万人。

(沙雪良)

以房养老 别开国际玩笑了！

■ 马光远

2014 年 6 月 23 日，保监会下发《关于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决定自当年 7 月 1 日起，在北京、上海、广州和武汉四地率先开展老年人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即以房养老)试点，试点期为两年。到今年 6 月 30 日，试点两年的“以房养老”迎来“大限”。两年时间，究竟有多少人响应？

告诉你，截至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四大试点城市只有 60 户投保，而且只有一家保险公司，也就是幸福人寿推出了相关产品。这几乎意味着，被一些人吹得神乎其神的“以房养老”政策彻底失败。

我对“以房养老”这个政策最终失败一点都不奇怪，因为，这本来就是一个画饼充饥、缘木求鱼、异想天开、匪夷所思的、最终结局只有失败一种可能的政策。这个政策的基本构思是这样的：一个人 30 岁按揭买了房子，在 60 岁退休的那一年终于还完了贷款，但为了养老，他在 60 岁的时候通过“反按揭”的方式，把房子卖给了金融机构，金融机构每个月给他一定的养老金，直至终老。

这种“住房反向抵押养老保险”，也就是很多国家流行的“倒按揭”的以房养老模式。比如你买房子的时候做一个按揭，交了首付，然后每个月还房贷。以房养老就是一种倒按揭，保险机构或者金融机构按照一个评估值，每个月给你一定的养老钱，养老送终，最后房子的产权归保险机构或者金融机构。

这种模式在美国、日本、德国、加拿大都存在，但在任何一个国家，这样的模式都只是一个补充的非主流的养老模式，也完全是出于老人和金融机构的自主选择，适合的人群非常小，也即“小众”的养老方式，本不值得大惊小怪。

但就是这么一个“小众”的养老产品，却被某些人吹捧成解决中国养老问题的钥匙。原因何在，就是面对中国养老金未来巨大的缺口，我们几乎到了病急乱投医的程度。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由于双轨制、历史欠账、计划生育导致的人口结构和老龄化趋势加快等原因，中国官方建立的养老体系基本无法满足足国人的基本养老需求。

在养老领域，中国的基本国情一是老年人口多。目前中国超过 60 岁的人口已经超过 2 亿，中国是目前全球唯一的老年人过亿的国家。到 2030 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将超过 4 亿，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中国养老的基本结构将是 2 个劳动力养活一个老人，这几乎意味着，即使没有历史亏空和巨大的缺口，未来的基本养老体系也几乎面临崩溃。二是未富先老。人口结构和我们相似的日本，尽管老龄化程度和我们不相上下，但其作为高收入国家，在养老问题上的压力远小于中国。

面对养老金的巨大缺口，大家纷纷提出解决之道，有提出延迟退休的，有提出“以房养老”的。必须明确地指出，政府的基本养老金和“以房养老”本不是一回事。

基本养老金是政府必须提供的公共产品，是政府给民众的承诺和责任。而“以房养老”本质上却是一种市场提供的“私人产品”，在中国也可认为是一种金融创新，是金融机构提供给有房的老人的一种金融产品，金融机构通过一定时间内定期支付给老人一定的金额，在老人去世后获得老人住房的所有权。

很显然，这和政府的基本养老金之间没有任何替代关系，老人不管有没有房子，不管是否选择“以房养老”，都不能替代政府提供基本养老金这个公共产品的责任。

然而，在养老金面临极大缺口的情况下，政策的制定者很显然“有意”在混淆公共产品和私人产品的界限，混淆这种界限的好处很明显：通过不断地刺激民众的神经，弱化他们对主流养老体系的期待，在养老领域转而寻求自我救济。如果不能明确“以房养老”的性质并且有意达到这种违约的目的，只会打击民众对主流的养老体系的信心，中国的养老制度将面临极大的信任危机，从而引发很大的不安和社会问题。

但很显然，由于中国人把房子留给子女的传统，以及房价的不断上涨，把自己的房子反向按揭的积极性实在不高。四大城市只有 60 户参与就已经说明问题。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面对中国养老金的巨大缺口，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填补缺口，以应对老龄化的来临。但未来任何的应对之策，都应该是夯实政府的养老责任，而不是减轻或者逃避。不管是变卖国有股，还是在人口政策上积极调整，唯一不能采取的办法就是违约或者变相违约延期支付，这都会打击民众对未来的信心。

“以房养老”在制度细节不完善的情况下，老人们是会算清楚这个账的，如果没有什么真金白银的激励措施，老人们凭什么把自己的房子反向抵押给保险公司呢？他还不如选择卖掉，拿到所有的钱，买一笔保险，每月有个固定收益，然后用这收益租个比以前更好的房子养老呢。

